

英国汉学家鲁惟一： 剑桥大学秦汉史大家与简牍学开拓者

□ 郎振嫻

英国汉学家鲁惟一（Michael Loewe）长期致力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对中国史前史、中国秦汉史和汉代简牍有独到而深入的见解，他把从古文书学的角度研究汉简的方法推向新的境界。鲁惟一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著述主要有：《汉代行政记录》《中国的早期帝国：一种重估》《剑桥中国上古史：从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年》《汉代的中华帝国初期的日常生活》《中国人的生死观：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等，主编并撰写《中国古代典籍导读》《剑桥中国秦汉史》《剑桥中国古代史》等。鲁惟一在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加深中外学术交流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汉学界有着非常高的声誉。

与汉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鲁惟一出生于1922年，是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和简牍研究学家，曾任剑桥大学东亚系主任，现为剑桥大学荣休教授、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院长。他先后就读于剑桥珀斯中学、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二战前夕，鲁惟一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学习西方古典语言。1942—1945年，鲁惟一在英国政府通讯总部接受日语培训，主要任务就是破译日军密码，其间开始学习汉语，1947年与同事莱斯一起被派往北平的英国领事馆。在北京生活期间，鲁惟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时开始研究东方文化。鲁惟一回国后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汉语本科学位，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培训汉语口语。学习现代汉语的同时，他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古代汉语，为其之后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语言基础。

1951年，鲁惟一凭借对中国汉代历史研究的杰出贡献获得伦敦大学亚非研

究学院本科一等荣誉学位。1956年，鲁惟一留校任教，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系工作。当时的伦敦大学学习汉语的本科生对汉语知之甚少，关于中国历史的教材也多采用英语、德语和法语版教材。在伦敦大学的汉语教学中，鲁惟一给学生开设过“中国历史概论”、个别朝代的专门史等课程，还为学生提供一对一专业辅导、学位论文写作指导等常规性工作。1963年，鲁惟一获得了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同年，他进入剑桥大学执教，直到1990年退休。

简牍学研究的开拓者

鲁惟一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居延汉简开始的。即便是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居延汉简也是天书般的存在，鲁惟一其中所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他对照古籍史书逐字研究简牍，搜集各类史料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因学术造诣颇丰而被中国国内学术界评价为“汉简研究绕不开的人物”。而鲁惟一本人对此却始终谦虚低调，他曾表示：“对于一个在欧洲历史、文学和哲学传统中接受教育的西方人来说，胆敢撰写关于中国汉代知识发展的论著，似乎有些冒险。”鲁惟一在某次采访中谈及自己的中文名字：“在剑桥从事简牍研究的我是‘惟一’的一个”。

在简牍学研究中，鲁惟一最重量级的作品是《汉代行政记录》。该作品是鲁惟一在他1963年伦敦大学博士论文基础上写就的，这本书对居延汉简进行了集成分类研究，推动了汉简研究走向深入。继敦煌汉简之后，居延汉简是考古发现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它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者，为汉代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居延汉简研究材料极为匮乏，鲁惟一当时可用的研究材料仅有

劳榦《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以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居延汉简甲编》等少数几种。鲁惟一说：“就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情况而言，恐怕没有谁研究这些简文所取得的成就是完全令人满意的。某些释文和翻译将长期受到怀疑，完全精确的释文和翻译始终难以企及。”因此，在当时缺少清晰版图和准确释文的基础上，鲁惟一仍然取得了相当规模的汉简缀合成果，实属不易。

在《汉代行政记录》一书中，鲁惟一主要采用了文书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即根据简牍的出土地点、大小和形制，简册的编联方式、笔迹，文书的布局及内容，结合汉代行政实践的特点，将零散的简牍及其残片加以集成；在所集成的同类简中，通过完整的木简标准，找出残简究竟残缺了哪些部分，而残缺部分又相当于完整木简的哪些内容，借以恢复简册文书的本来面目。在研究中，有些简牍支离破碎、文字不全，乍看好像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但是借助于文书学的研究方法，把它们与相关的简牍排列在一起，往往就会凸显其独特的研究价值。汉简缀合研究的不确定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彰显了鲁惟一作为一位优秀简牍学研究者谨慎认真的态度和质疑探索的精神。

任教剑桥大学致力秦汉研究

剑桥大学资金雄厚，汉学教师资源配置较为完善，依托这一平台，鲁惟一与崔瑞德合编了《剑桥中国秦汉史》。这本书从最初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到翻译成中文出版，前后不过6年时间，在中国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鲁惟一在这

部书中承担了导言、前汉、政府的管理与存亡攸关的问题（公元57—167年）、政府的机构与活动等写作内容，超过全书内容的三分之一。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新资料和新研究的大量积累，鲁惟一对秦汉史的总体认识也有了较大的改观，认为有必要对原来的《剑桥中国秦汉史》进行一些内容上的补充。于是，鲁惟一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戴梅可合编了《中国的早期帝国：一种重估》，以此作为其对《剑桥中国秦汉史》的补充与拓展。鲁惟一将对秦汉史的研究置于英国汉学、西方汉学乃至世界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为其学术著述、学问成就找到合适的历史方位，给予比较公正客观的评价，从而对当下西方汉学所表现出的一些趋势和特点，作出更加清晰的判断。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强，鲁惟一获取来自中国的研究资料越来越方便，了解和吸纳中国本土学者最新研究观点也越来越及时，为他在既有研究领域取得新成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鲁惟一认为，一个学者的学术自觉和学术担当非常重要，它可以让你远离学术功利化的诱惑，也可以让你更加安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抱持此种学术信念的鲁惟一，不管身处什么样的时代，都能够专心学术研究、长期耕耘，注意史料的整理、搜集和汇总，以高质量的作品为读者提供一个可资比较的历史文化视角。



龟的文化隐喻及其变迁

□ 章 林

在我国，龟与龙、凤凰、麒麟合称为四灵被世人信奉，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在四灵之中，麒麟、凤凰与龙均为人们想象虚构出来的动物，只有龟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动物。那么，龟这种动物是如何进化并一直存续下来的呢？龟又有哪些文化隐喻呢？

龟的发展历史

据科学考证，龟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爬行类动物之一，约2.25亿年前，海洋中便出现了海龟，并逐渐进化为陆龟。龟最大的特征便是身上长有非常坚硬的甲壳。但是，最初的龟只长着硬质的腹甲，而没有背甲。在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变后，龟为了增强抵御外袭的能力才进化出了坚固的背甲。即便如此，早期的龟可能还不能将头部与四肢缩入甲壳中。此后又经过漫长的岁月，当龟受到袭击或者感到不安时，可以把头、尾及四肢蜷缩进龟壳内，把自己严严实实地保护住，由此龟的进化史才告一段落。

龟的种类在全球有250多种，它们大都喜欢在气候温暖的地方生活，多为水栖或半水栖。龟的分布十分广泛，全球除南极洲外所有大陆均有其生活的轨迹。作为变温动物，龟随着周围温度的变化而改变体温，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龟虽然行动缓慢，但在捕食时却十分敏捷，且可以长期忍受禁食。龟作为与恐龙同时代的动物，能够在地质变化、火山活动和气候演变等各种剧变中，顽强地存活下来，足以说明它是极具适应环境变化能力的物种。

龟的文化隐喻

古代的人们在和动物界长期的相处中，对甲壳护体、水陆两栖、耐饥耐

渴、“不食不死”的龟感到甚为神奇。这就对龟产生了崇拜，并发展出许多远超其生命实体的文化隐喻。

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龟常被视为无与伦比的吉祥之物。尤其是人们普遍认为龟的寿命很长，因此常与仙鹤、仙桃、梅花鹿等一并视为长寿的象征。在传统的吉祥图案中，带龟的图案是经常使用的装饰题材。在古人诗文中，也往往将龟与寿联系在一起，寄寓美好。在民间风俗中，一些60岁以上老人的寿诞称为“龟寿”。在祝贺词中，用一些关于龟的词语来表达客人对于主人长寿的祝愿。同时，贺品也使用龟形的食品。在一些地区，人们为了祈求孩子能够健康长命，在前额留一大块长发，形若龟盖，同时在后脑勺再留一绺长发，像是龟尾巴，俗称“乌龟梢”，又叫“百岁毛”。

龟还代表着财富。在夏商周时期，龟贝便作为各种物资的等价物，同金玉一样是万能的财富。秦朝以后，龟贝的货币属性虽然被金属所取代，但龟作为财富和地位的寓意却得以传承。《史记·龟策列传》载：“能得名龟者，财物归之，家必大富至千万。”直到今天，可见以龟为摆件放在商铺或家中以示招财，同时也有人养活的金钱龟。此外，以龟寓意财富的“金龟婿”等词语也仍在沿用。

龟因四肢粗壮有力与甲壳的承受力超乎寻常而象征力量。在女娲补天的神话中，正是用神鳖之足顶天撑地，使万灵始得以安居。印度的一个传说认为，八只白象站在龟背上支撑着地和天。在西方，也有世界实际上是驮在一只龟背上的传说。在现实中，许多龟都能承受千斤巨石的压力，以至于一些地方将其用于驮运货物。龟的甲壳因具有坚硬的特性，因此被视作坚固的象征。如用来抵挡矛的盾、护头的盔、防身的甲等，均取龟甲之形或之义。古代的城池为了

军事防御有时也修建成龟形，如山西平遥古城总体布局就是按照龟的式样设计的，因此被称为“龟城”。在日本入侵朝鲜的王辰战争中，朝鲜著名军事家李舜臣通过研制的龟船，赢得海战的胜利。此外，龟还作为战争中将帅旗帜上常用图案以及调兵遣将的兵符，用以稳定军心，提振军威，鼓舞士气。

我国龟文化的发展

中国的龟文化源远流长，在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许多神话传说可知，早在原始社会，龟就作为部落民族的图腾受到人们的崇拜。先民还将龟视为沟通天神和人君的神灵化身，以灼烧龟甲使其裂变成五花八门的“龟象”来预测吉凶祸福，形成龟卜文化。从商代开始，凡遇登极、出征、祭祀、田猎、婚配、生育、丧葬等重大活动，都要先用龟甲裂纹来占卜，并用刀将占卜中得到的答案刻在容易保存的龟甲和骨头上，从而形成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在中国文化史上刻下了不朽的印记。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竹简的广泛应用，尤其是东汉改良造纸术的出现，龟丧失了承载文字的功能，但龟的整体地位却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象征皇位的鼎开始铸上龟纹，名为“龟鼎”，寓意汉家天下长同龟寿。朝廷将龟与皇族祖宗一并供奉在祖庙中，以期神龟能与祖宗神灵共保汉室江山千秋万代。此外，皇帝授给丞相、列侯、将军的印绶皆为龟钮，皇帝銮驾时除打起龙凤虎旗之外，还要打起龟旗。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龟文化基本沿袭汉代风俗，同时又有新的内容和形式出现。如以龟为帝王年号、出现龟形墓志等。正如民俗学者刘兆元先生所言：“在这个

时期，虽然地分东西南北，人人各保其主，主又有各种旗号，但人们对龟的崇拜是一致的。中国的龟崇拜，传统的龟文化，始终维系着每个炎黄子孙的心，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分久必合的一条根。”

唐代把对龟文化的推崇发展至历史的高峰。此时龟的权威开始直接表现在大庭广众之下。贞观伊始，满朝文武，知县以上都穿上有龟图案的绿色官服。武则天执政时，五品以上的官员腰间都要佩龟袋（亦称龟佩）。龟袋上分别饰有金、银、铜三种金属，对应官员品级，即金龟袋、银龟袋、铜龟袋。由此，百姓见到身上佩龟者既知是大官，再根据龟的质地又可知官阶高低。龟的权威不仅表现在人的方面，而且体现在事的方面。从唐代开始，凡被认为是万民所颂的重要事件，均以外形似龟的神兽驮碑这一形式纪念，这种神兽名为赑屃，是龙的九子之一。在唐代，龟文化还传播到各亚洲邻国。

到了宋代，龟文化从朝堂普及到民间，并被赋予淡泊名利、高风亮节、与世无争等新的寓意，成为一种处世做人的心态与追求。许多文人都表达出“愿作泥中曳尾龟”的洒脱心迹。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对在地球上自强不息地存活了2亿多年的龟有了更加全面、充分的认识。龟作为“活化石”被用于生物学方面的科学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现在，由于环境污染，龟的栖息地被大量破坏，一些龟种已处于濒危状态，需要我们加强对它们的保护。



2023年8月4日 星期五
STUDYTIMES

學習時報 | 07

（上接1版）有的领导干部执政一方，为了引起上级的关注，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喜欢做显山露水、表面风光的事，对那些虽不轰轰烈烈、但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小事、杂事、繁事、难事却不感兴趣；有的领导干部热衷于打造“可视范围”内“高大上”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违背客观规律，脱离当地实际，搞破坏性开发、掠夺式经营，乱铺摊子，劳民伤财，使一代人的政绩成为几代人的包袱；有的领导干部热衷搞“自我设计”，醉心“晋升路线图”，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能走得更快、升得更高，着重在“唱功”上做文章，而忽略“做功”，习惯于广播里有声、电视里有影、报纸上有文。有的欠发达地区的领导干部，贪图搞“短、平、快”，急于做出成绩来显示自己的才能和魄力，对当前、届内出效益的事情考虑得多，为今后和下届做铺垫的事考虑得少，结果造成“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的后果。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以实际行动践行好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眼前利益、个人利益统一起来，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以对人民和历史负责的态度，甘当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多做一些功在当代、利在长远、惠及子孙的事情。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人在仕途，不必对“名声”看得过重，而须时时考虑怎样才能做个对地方、对百姓有用的官，关键还要看群众满不满意、答不答应。为官一任，如果能造福一方百姓、推动一方发展、守护一方平安，从政声誉如何百姓心中自然有杆秤。

处理好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

处理好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

有职就有权，有权就有责，用权受监督，这是共产党人权力运行中的铁律。权力为责任所系，领导干部只有视权力为一种责任时，才会珍惜、慎用权力，才能不误用、滥用权力。从近年查处案件情况看，有的党员干部独断专行、擅权妄为，凌驾于组织之上，凡是他定的事都不容置喙，把民主集中制异化为“家长制”，把执权部门当作“自留地”，把职责范围视为“私家花园”，以言代法、违规决策，搞一言堂、当“一霸手”，搞逆规矩名存实亡、潜规则大行其道；有的失职渎职、弃权不为，躺平于得过且过，工作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更有甚者玩忽职守、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一些基层领导对党员、干部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违纪违法行为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甚至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最终养痍遗患，造成恶劣影响。

权力是责任和义务的结合体。拥有多大的权力，就要负多大的责任。汤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铲除权力腐败的祸根，要在强化权力责任上下功夫。一方面，党员、干部要正确行使权力，必须坚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立场，把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权力的

行为后果负责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围绕权力的行使建立严格的越权渎职、滥用职权的责任追究和惩处制度，形成公正、透明、高效的执政用权体制，真正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

处理好干净与干事的关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

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丧失初心、欲望难填，痴迷于权力寻租，把权力看作是谋取个人私利的介质，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作为信仰，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作为信条。这种人当官就是为自己能升迁、出政绩，不惜劳民伤财，牺牲群众利益谋“私绩”；枉费心机，中饱私囊谋“私利”；贪图享乐，挥霍浪费谋“私欲”；得陇望蜀，既想当官还想发财。这种极端的利己主义，严重背离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其根源是错误的权力观和价值观在作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民谋利”。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我们要时刻牢记自身所肩负的是群众的信任与组织的重托，时刻保持健康的思想情操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增强自律意识，加强自身党性锻炼和道德修养，常修为官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缚，永葆公仆本色。

处理好尽责与问责的关系，始终做到心中有度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纪检监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职权，最重要的是开展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凝聚人心、凝聚党心。监督执纪执法权运用得好，就能够保障公权力正确行使，促进干部履职尽责；监督执纪执法权运用得不好，纪检监察工作就背离了党中央要求、背离了基本职责、背离了初心使命。

一方面，坚决整治、严肃查处违背客观规律大干快上、大肆举债搞“半拉子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和统计造假屡禁不绝等虚假政绩观问题。另一方面，坚决摒弃“以大案要案论英雄”的错误政绩观，做到对党和人民负责，对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负责，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不可泛化滥用、简单问责。我们要秉持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纪法规为准绳，就是一是，二是二，不枉不纵，既不刻意拔高，也不降格以求。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要注重把握运用党的政策策略，既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又注重把握好力度节奏火候，坚定稳妥推进反腐败斗争；既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又坚持辩证历史客观地看待干部、判断事情，注重教育人、挽救人，维护党内政治生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既深化运用“四种形态”，又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推动纪法情理贯通融合，凝聚干事创业正能量，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

（作者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监委主任）